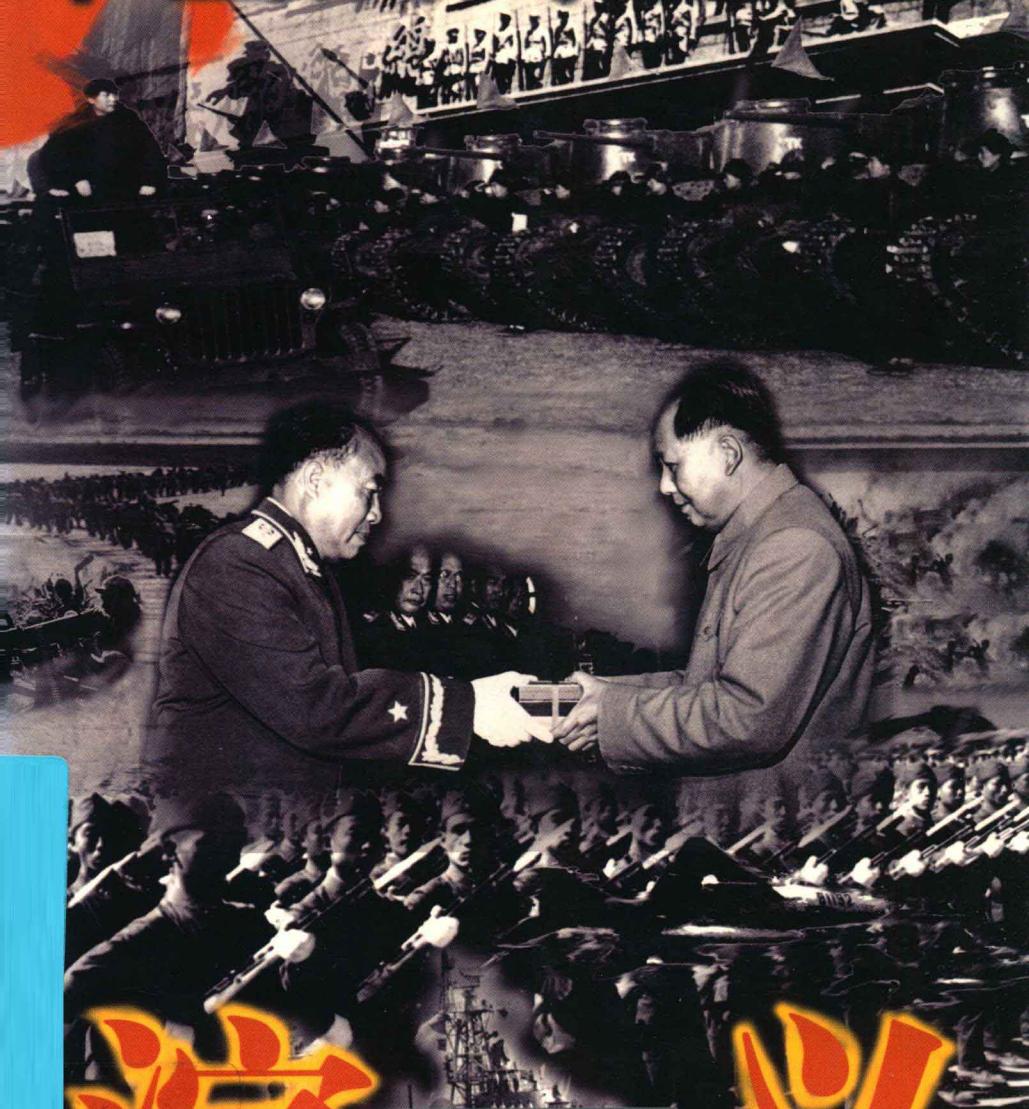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解放军



演

张涛之 著

中 卷

义

张涛之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

演义

中卷



中 卷

第四十五回

周恩来题词揭皖变 毛泽东发令建军部

话说皖南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得到顾祝同、何应钦等人的报告，得知新四军军部全军覆灭，叶挺被俘，袁国平战死，大为高兴，传令嘉奖有功部队，严令搜捕项英、周子昆。接着，他又召集陈诚等人，商讨善后事宜。善后的方针那是早就定了的。他“唵”“唵”了几声，训示道：“新四军进攻我部阵地，实成叛军。为军令政令之严肃计，必须予以严惩，撤销该军番号，通缉项英。军委会已草拟了一道命令，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修改的？”这道命令事先已由陈诚、陈布雷等人仔细斟酌、修改过，大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说。蒋介石便下令：“那就于后天，1月17日颁布，1月18日重庆各报都要刊登。”说完这句话，蒋介石马上想到了一件事，命令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你去通知新闻检查局，把新华日报看紧些，不要让他们刊登些不妥的东西出来。此事不能掉以轻心，要派人，要派检查员守在奸报社里，看大样，千万不能出差错。”

军委会新闻检查局局长接到命令后，立即申饬重庆新闻检查所对新华日报馆加强监督，务必派员坐馆检查大样，不能让该报登出一点透露皖南事变真象的文章。重庆新闻检查所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一名检查员去重庆郊外化龙桥报馆坐守。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是北伐期间，也就是1927年建立的，那时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一些城市设立检查机构，检查报纸，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正

式在军委会设立新闻检查局，局下设新闻检查所若干，分驻全国报纸集中的一些城市，检查报纸，防止泄密，同时也是为了钳制言论。重庆新闻检查所是个大所，主要对付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新闻检查机构隶属军委会，自然是军事编制，局长为中将，所长为大校或上校，工作人员从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中挑选。一些失学、失业青年为生活所迫，无奈到此机构工作。由于这里没有外快，生活贫苦，人员流动较大，这里就不多说了。

此年，也就是 1941 年 1 月 17 日晚被派来的新闻检查官是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他来到新华日报馆后，当被该报编辑室主任章汉夫训了一顿：“一个热血青年，不去前线打仗，不去动员民众抗日，却来干这种不光彩的事情，你还有没有良知？”年轻的检查官红着脸，恳求说：“我这也是为生活所迫，只要你们不刊登违检的东西，其他都好商量，就请你们照顾我一次吧。”章汉夫奇怪地问道：“明天要刊登的文章不是都已送检了吗？你还跑来干什么？”检查官尴尬地笑笑说：“上级派我来贵馆，要审查明天的大样。”章汉夫心里吃了一惊，鬼家伙，看文章还不够，还要看大样。他冷冷地对检查官说：“你坐在这里等着吧，大样要到晚上子夜才能出来。”检查官连连点头：“我明白，我明白。”

章汉夫安顿好检查官后，走进去向总编辑潘梓年作了汇报。潘梓年想了想，断然说：“不要紧，我有办法对付。”两人正在商议对策，编辑熊复进来报告说：“我们要发表的那篇通讯叫新检所扣了。”潘梓年挥挥手：“快打电话报告恩来同志，他现在正在红岩办事处。”章汉夫闻命打电话去了，熊复赶紧进屋组版。潘梓年吩咐熊复：“你把一版上刊登揭露皖变消息的通讯的那块版面留出来，另外，你再照这个版面编一个版，给新闻检查官

看。”熊复一愣，问道：“这是为什么？”潘梓年给他附耳一番，熊复恍然大悟，连忙划版去了。

话说周恩来当夜正在红岩办事处（对外的公开名称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实际上也是南方局机关驻地）与处长钱之光、童小鹏等人商议应变问题，突然接到潘梓年电话，得知该报明天要见报的一篇揭露皖变真象的通讯被新检所检扣。周恩来放下电话，两手叉着腰，站在那里沉思。屋子里的人悄悄地，等着他的决定。只见周恩来脸上一会儿浮现出悲愤的神色，一会儿又浮现出果决的神色。突然，周恩来转过身，吩咐说：“拿纸笔来！”

纸笔很快拿来了，周恩来铺开纸，用毛笔蘸饱墨，在宣纸上写起来，于是，十六个浓粗的严体行书大字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写完了这四句诗，周恩来又提笔写道：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周恩来放下笔，对童小鹏说：“你快去把岳仁和叫来。”童小鹏急步来到楼下的寝室，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副官岳仁和：“快起来，周副主席正等着你呢。”岳仁和飞快地穿好衣服，揉着睡眼惺忪的双眼，和童小鹏跑到楼上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严肃地问他：“岳仁和，去新华日报馆的路你熟吗？”岳仁和睡意全消，肯定地回答：“很熟。”周恩来点点头，把题词卷好，交

给岳仁和，叮嘱说：“你把这件东西送给潘梓年，要他想办法登出来，天亮前，把报纸都散发出去，一定一定。”岳仁和拿起题词，周恩来又叮嘱道：“不要走前门，从后山下去。”岳仁和敬个礼，答应道：“明白。”

岳仁和躲过特务的监视，从后山赶到新华日报馆，把题词交给潘梓年。潘梓年跑到编辑部，对章汉夫和熊复说：“快，把周恩来的题词照像制版，登在一版的天窗上。”章汉夫、熊复紧急行动起来，制版，打纸型，浇版，印刷机轰隆隆地转起来。报社所有能出动的人都在外面等候，报纸下来一批，即被取走，带到城里散发去了。报纸大部分印出带走了，时间也到了子夜。章汉夫慢腾腾地拿着一块铅版走出来，请检查官看。检查官看了后，没有发现违检文章，便放心地走了。此时，化龙桥、红岩、曾家岩三地的中共工作人员已把报纸塞进了重庆千家万户的门里，那些各界代表人物更是赠阅的重点照顾对象。

蒋介石当夜得到政治部张治中部长的报告，得知新华日报馆没有异常的举动，便放心地睡了一觉，到第二天上午，才知道《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这天，也就是1月18日的报纸已经散发到千家万户。他不禁恼火万分，但又无计可施，因为领导人的题词是循例不送检的。《新华日报》没有违检。无奈之中，他下令军警宪特一齐出动，驱赶报贩，没收报纸。谁知事与愿违，报贩乘机高价出售《新华日报》，有的外国记者当夜不在重庆，此日上午回到重庆，发现街上气氛异常，细问同行，才知道《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将军抗议皖变发动者罪行的题词，于是到街上四处寻觅，竟以八十元（当时重庆日报一月的订费是3元）的高价从报贩手里购得一张《新华日报》。由于重庆电讯实行检查，这些外国记者乘美机飞往香港拍发电讯去了。

再说周恩来于1月17日夜写好题词后，未及休息，又把叶剑英和南方局的几个干部找来。周恩来望望窗外黑沉沉的天，神色凝重地说：“必须彻底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我刚才写的题词只能起到披露发生皖变，我党表示抗议的作用，还必须写一篇全面分析皖变的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是不可能通过检查的，但可以印成传单，秘密在市内散发。文章不要署名，只注明时间即可。我口授一下要点，你们下去写好后，我再修改审订。你们记一下，题目是，皖南新四军惨被围歼真象……”

叶剑英等人记下周恩来的口授要点，然后回到军事组写起来。叶剑英亲自把关，反复修改，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这篇七千多字的长文章写好了。周恩来看完这篇文章，觉得很好，有几个地方他又作了修改，然后在文章最后写上日期：“民国四十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随即叫来副官，让他把这篇文章送到新华日报馆印成传单，叫报馆在市内广为散发。潘梓年接到传单后，立即用最好的有光纸把传单印好，让报丁和职工在晚上广为散发。

由于这篇文章被印成传单，《新华日报》的版面上是看不到的，时间一长，渐被人们遗忘。四十年后，中国大学的一个研究生经过仔细的研究和推论后，终于在预测的地点重庆市档案馆发掘出了这份传单的原件，这大约是存于世上的唯一的一份原件了。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且说周恩来在红岩村布置了写文章的事情后，又忙着安排三岩的干部疏散的问题。所谓三岩乃是虎头岩下的化龙桥新华日报馆，红岩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城里的曾家岩周恩来办事处。这三岩有中共干部数百名，鉴于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必须把三岩的大部分干部疏散，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以避免

大的损失。这个工作很重要，又要安排仔细，不能出一点问题。在冬日雾气濛濛的重庆市，红岩村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划破夜雾，给山城人民带来了巨大鼓舞。

再说那些外国新闻机构派驻重庆的记者，由于有着种种中国记者所没有的便利和条件，在拿到1月18日刊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后，立即飞到香港或拍发电讯，或让航班带去报纸。皖南事变的消息立即传遍了世界。延安的新华通讯社抄收到了这些电讯后，立即手写一份，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了，连呼：“警卫员，快请总司令、稼祥来。”朱、王二人刚一进门，毛泽东便招手道：“总司令，快来看这则电讯。”三人围着看了一遍电讯，毛泽东指着题词说：“你们看看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走到桌子前，拿起一迭手稿说：“这是我为中央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和命令，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

朱德拿过手稿，一边看一边念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功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为保卫民族国家，

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毛泽东说：“总司令，你再看谈话。我骂重庆发言人是蠢猪，他们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朱德王稼祥听了赶快再看谈话，看完之后，经过商议，三人决定1月20日发表命令和谈话。

1月20日，延安通过《新中华报》、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命令和谈话。刘少奇和陈毅等人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后，立即于1月23日发表通电，宣誓就职。次日，在盐城隆重举行了新军部成立大会，新四军将领于大会后发表声讨亲日派通电，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新四军新军部将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整编后的新四军真是雄兵十万，猛将千员，又有一番新气象。新军部立即部署了华中敌后抗战的作战战略。二师、四师奉命在津浦路两侧展开，准备迎击敢于进犯的敌军；五师奉命以一部兵力从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南下，与七师、二师、五师打通联系，便于七师发展皖中。一师、三师奉命继续在苏北活动，建设好苏北根据地。六师奉命仍在苏南活动，痛击江南敌寇。新军部一声令下，全军闻风而动，大江南北频传捷报，凶寇在新四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穷于应付。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里，报丧的电话接连不断。早有军统情报人员把这些消息上报了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

蒋介石近来心情很不好。新四军军部被歼后。他认为新四军从此群龙无首，会如鸟兽散，万不料中共中央发动了凌厉的政治攻势，直骂自己是蠢猪。他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又命令组

建新四军新军部，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率新四军将领立即通电就职，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整编成了七师一旅。他还没有想到海外华侨抗议皖南事变的通电如雪片般飞来。华侨在抗战开始以来的三年间，捐输了大量钱物，仅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三万万元，够全国全部军队 200 个师用一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假若华侨一旦停止捐款，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蒋介石更没有想到皖南事变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地方实力派担心蒋会以此为开头，吞并他们的地盘和部队，开始疏远中央势力。所有这些事，都是蒋介石不曾想到的，怎么应付全国人民的责难，怎么对付中共的强大的政治攻势，蒋介石彷徨室内，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还有更糟的事呢。就在新四军将领通电宣誓就职的第三天，外交部长王世杰陪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来会见蒋介石，这是事先已约定好的。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取消出席中国使馆定于 1 月 17 日举办的宴会的计划，建议宴会改期。此外，苏联外交部及驻华使馆多次对蒋介石提出抗议。今天，也就是 1941 年 1 月 25 日，潘友新又来会见蒋介石，自然又是提抗议来的。果然，潘友新大使坐定后，三言两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苏联政府的意见：“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蒋介石听了心里一沉，强露笑容，应付了一番。蒋介石知道这个抗议的分量，抗战以来，苏联的援助都给了自己，没有给过延安，假如苏联翻脸，把自己的援助都给了延安，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就在蒋介石心烦意乱的时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居里来中国了，蒋介石心头为之一喜。美国政府是赞同自己的反共限共政策的，又是一个大施主，每年给中国不少的经济援助和军火援助，只要居里讲一句话，那就等于给那些反对自己的人

一个狠狠的打击。于是蒋介石下令侍从室好好准备，待居里来华时热情款待一番。

居里来华是二月初旬，重庆九龙坡机场一片欢腾。居里的飞机停稳后，国民党要人云集机场，热烈欢迎居里来华访问。蒋介石由于身份所限，不便直接去机场，独自一人在宴会大厅里走来走去，焦灼地等待居里赴宴。然而等了好久，芳客未至，王世杰却满头大汗地跑来了，蒋介石情知情况不妙。果然，王世杰不待他开问，就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居里下飞机后，住进了美国使馆，他提出要先见周恩来，再来拜会委员长。”蒋介石如冷水浇头，气急败坏地喊道：“不行，不行。你们去想办法，绝不许他见周恩来。”王世杰连连点头：“是，是。”过一会儿，他见蒋介石气平了些，便试探地说：“委座，居里是罗斯福的特使，他的态度关系到美援呢。”

蒋介石这时头脑冷静了些，权衡利弊，知道不让居里见周恩来是不行的，便挥挥手说：“让他去见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心里有数，美国离不开我。”王世杰见蒋介石松了口，便出去安排去了。

周恩来这段时期忙着安排三岩工作人员撤退的问题。该走的，他都与之谈了话，并且仔细检查了细节。留下的一百多人，周恩来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气节教育，并统一了被捕后的口供：万一被捕，当敌人询问重庆中共领导人是谁时，就说是周恩来，再问还有谁时，就说还有董必武、邓颖超，其他人一概不许供出。

这天，周恩来正忙着与三岩的人员谈话，童小鹏手持电报从三楼跑下来，把一封电报呈递给周恩来，紧张地说：“副主席，毛主席来电，为防止敌人下大毒手，中央命令你和董老、邓大姐立即撤回延安。”周恩来打开电报仔细看了一遍，断然地说：

“向中央回电，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但重庆的斗争非常紧张复杂，请求中央让我继续留渝领导斗争，颖超也不宜离开，可送董老回延，你把这个意思给董老讲讲，让他准备一下，择日回延。”童小鹏听了，跑出去报告董老去了。过一会儿，他又跑回来报告：“副主席，董老说，让你和大姐立即回延，他留渝领导工作。”周恩来无奈地摊开双手：“我早知道董老会这么说的，不要再劝了，劝也没用。你把董老几个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请来，我们开个会，把中央的电报让大家讨论一下。我要向大家讲明，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是绝不会离开重庆回延安的，我要同大家一起共患难，一起作好被捕牺牲的准备，这是我的人格、党格。”童小鹏激动地说：“副主席，有你在，我们什么危险都不怕了。”

在发走了给延安的回电以后，钱之光又跑来报告：“副主席，周公馆来人报告，国民党政府通知他们，居里要指名见你，请你立即进城。”周恩来听了，连忙坐上办事处的小车，经化龙桥、李子坝、牛角沱回到了曾家岩的周公馆。他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当天的报纸，也就是2月14日的报纸阅读起来。这时的《新华日报》由于报馆人员撤走了一大半，只剩下八十多人，同时也由于新检所的苛刻检查，许多文章登不出来，只好改出一中张。看完了《新华日报》周恩来又看《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只见上面登着几篇敦促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文章。周恩来“哼”了一声。把报纸扔到桌子上。

过一会儿，门外响起了刹车声，居里来了！周恩来走到会客室门口，和居里握手。二人坐下后，居里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周将军，你以为日本下一步的战略是南进呢，还是北攻？”居里所说的南进，是日军进攻南洋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等英美殖民地；北攻是指日军进攻北方的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外人士已经发表了很多的文章，美国、英国

两国政府也在极力揣猜。

周恩来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诺门坎一战，日军自知陆军兵力比不上苏联。但他们在太平洋上却拥有海空优势，日本军方很担心这种优势会因英美的备战而丧失，故此他们会南进，同英美作战。解决了南洋问题后再伺机北攻。”居里点点头，深以为然。周恩来深知美国希望中国团结抗战，把日军牵制在中国，使日军不能分兵南进的意愿。他严肃地向居里说：“蒋委员长自在皖南歼灭新四军军部后，正准备进一步扩大分裂，全面剿共，这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那样一来，日军便可放手南进。”居里连连点头，完全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他翻翻周恩来递过来的一叠材料，面露愠色地说：“我们反对委员长扩大内战，如果他不立即停止反共，美国将停止一切援助。”

拜会了周恩来以后，居里才来会见蒋介石。尽管蒋介石招待极为热情，但居里却神色冷淡。他用茶碗盖撇撇茶水上的茶叶，即放下杯子，正色说道：“我非常感谢委员长的款待，但我不得不正式通知委员长，罗斯福总统指示，在委员长停止剿共前，美国停止援华，中美之间的一切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蒋介石放下杯子，强作镇定地解释说：“居里先生，请你不要听周恩来的一面之词。皖变发生，实在是因为新四军不奉令北移，却擅自行动，攻击我云岭以南的部队防地，我部不得不实行自卫。辞修，请你把地图给居里先生看看，你一看就会明白的。”居里推开陈诚递过来的地图，反问道：“委员长，新四军军部有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其中有许多还是妇女，军部被消灭后，她们中的许多人被贵军任意奸杀。这样一支部队，怎么会去主动进攻十倍于自己的贵军。委员长，我也是军人出身，这

点军事常识我还有。”

送走了居里，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居里：“帝国主义分子，仗着有几个臭钱就要威风，我不吃这一套。”宋子文劝道：“委座，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还是考虑一下怎样应付这个局面吧。”蒋介石喊叫道：“考虑什么，把他送走，让他滚回美国去。”宋子文笑笑说：“我刚才送他上车的时候，居里说，他不走，要观察国民参政会会议。”蒋介石伤心地说：“他明知奸党参政员不出席会议，偏要留下观察，是要我的好看呵！”

陈诚、宋子文、王世杰听了，默默无言。蒋介石又问陈诚：“平汉路战事怎么样了？”蒋介石问的是日军七个师团于上月 24 日突然进攻平汉路汤恩伯所部十五万部队的事。陈诚如实回答：“战况激烈，我军损失很大。”蒋介石奇怪地问：“皖变前，敬之（何应钦）保证，日军不会向我进攻。你们说说，我们打新四军，日军不但不助我剿共，反而乘机向我军进攻，这是为什么？”陈诚小心地回答说：“东条英机发表声明，说解决支那事变不能依赖国共冲突，要靠自己的力量。另外又说我们把八路军、新四军都调往华北，触及了他们在华北的利益。大概在东条看来，现在正是削弱我们的好时机，所以发动了这场大战。”蒋介石“啪”地把桌子拍得山响，大骂何应钦：“敬之误国，敬之无能。”

要员们屏住气，听蒋介石发脾气骂人。等到蒋介石骂完人，出了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小心翼翼地说：“委座，国民参政会预定的会期三月一日马上就要到了，中共七参政员仍拒不出席，您看……”蒋介石明白，七参政员不出席，将会在政治上使他更加被动。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所以耐着性子对王世杰说：“你去，和淮南（张冲）一起，劝说毛泽东，哦，他在延安不会来的。你们起码要把中共七参政员中的董必武、邓颖超拉来出席，告诉周恩来，只要董、邓二人出席参政会，一

切都好说。”

王世杰和张冲奉命劝说周恩来，务必让董邓二人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拿出一封公函说：“我党中央电示，欲使董邓二人出席，必须解决我党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中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十二个条件，这是我党中央的正式公函。”

王世杰接过公函，看了一遍，其实他不看也知道十二项条件的内容：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这十二项条件是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中公布的，当时蒋介石置之一笑，根本不予理睬，现在却成了中共七参政员出席的必要条件，王世杰不敢马虎，立即向蒋介石汇报去了。

张冲知道这个公函的份量，他劝说道：“周先生，是不是请你把这份公函暂行收回几天，我好从中奔走，请委员长出面约你谈话，一切问题可以最高层商议解决嘛。”周恩来摇摇头，坚决地拒绝了张冲的要求：“不行，近一个时期来，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之极，是可忍，孰不可思？”张冲提醒周恩来：“委员长是吃软不吃硬的。你这样固执，委座会翻脸的。”周恩来拍拍沙发扶手，站了起来，义无反顾地说：“翻脸是已经半翻脸了。再翻脸，不过是把我周恩来抓起来，我是早就准备着了。”说完，周恩来命令副官送客。

眼看离国民参政会开幕的日期只有四天了，中共七参政员仍不出席，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国民参政会是抗战之初成立的，由各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组成。虽然这只是个咨议机构，但也是全国团结抗战的一个象征。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已于皖变前十几天向全国公布，第一次会议定在1941年3月1日，中共七参政员如不出席，会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破坏团结抗战的被动地位，因此蒋介石连命张冲去劝说周恩来。张冲劝了三个多小时，周恩来拒不撤回公函。张冲苦苦哀求道：“周先生，抗战以来，我作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总算为两党团结出过一些力，我和周先生的交往也不算浅了。这次你就当我个人求你，撤回公函吧，我给你跪下去了。”周恩来一把拉住张冲，半天叹口气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们又是皖南消灭新四军，又是政治压迫，又是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

眼看参政会第二天就要开会了，中共七参政员仍拒不出席，蒋介石急得团团转，指令王世杰、张冲开专车轮流去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均为周恩来拒绝。无奈，国民参政会在中共七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下开幕了。由于没有中共的参加，这个参政会已失去了全国团结抗战的象征意义，国内外舆论大哗，对蒋介石的责难和质问从国内外连连而至，蒋介石无奈，只好在3月14日约见周恩来。

自皖变发生后，蒋周是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唵”“唵”了几声，寒暄道：“两个多月事忙，一直没有见面。现在参政会开完了，请你来谈谈。贵党有什么要求，请你提出来，能办到的就办了。”周恩来问道：“关于新四军问题，委员长总该有个表示吧。”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请喝茶。恩来，请喝茶。这是上好的毛峰呢。”周恩来把茶碗推到一旁，继续问道：“还有各